

论曹禺话剧《雷雨》的悲剧构成

李旭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雷雨》是中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阐释《雷雨》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从悲剧构成上来看,它是彻底的悲剧作品,既是命运悲剧,也是爱情悲剧;既具有性格悲剧的要质,又具有道德悲剧的特征。

关键词:《雷雨》;悲剧;命运;爱情;性格;道德

中图分类号: I207.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47X(2008)01-0097-04

《雷雨》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从她诞生开始就被界定为一部悲剧,一部纠缠着复杂的血缘关系和聚集着许多巧合,但又透露着必然的悲剧;是一幕人生悲剧,一幕集中描写了周、鲁两个家庭成员之间前后30年的复杂纠葛和由此形成的悲剧。曹禺也因此为我国现代悲剧艺术的发展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栋霖说:“从西洋悲剧、中国古典悲剧演变、过渡到能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悲剧艺术,曹禺成功地拓开了一条新路,为悲剧艺术如何反映中国现实生活提供了典范。”^[1]作为悲剧艺术的典范,历来说不尽道不完,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感受和结论。

一、命运悲剧

正如曹禺在《雷雨·序》中所说,“这篇戏虽然有时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莱的先知们称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刻意写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写命运无情,是《雷雨》的哲学意蕴,这也使其具有典型的古希腊命运悲剧的特点。《雷雨》充分利用悬念、

巧合、重复、对比等技巧,制造古希腊命运悲剧情调中的神秘、紧张和令人恐惧的一面。30年前遭到周朴园遗弃的梅侍萍寻死不成,历尽艰辛,受尽磨难,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惨痛的教训要她努力躲避穷人受侮辱与损害的任何可能。然而,极力躲避的命运,不期然地落在了侍萍的头上:女儿四凤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和周公馆大少爷的恋情里不可自拔,重复着母亲30年前的悲剧;女儿的恋人恰恰是自己遗留在周家的亲生儿子,他也在重演着父亲当年的故伎。“命运”始终是全剧的最高主宰,它轻而易举、反反复复地捉弄、摆布场上人物。隐忍退让的鲁侍萍时时警惕、步步为营,无时无刻不在恐惧的煎熬中希冀逃脱命运的惩罚;自大蛮横的周朴园对于前半生的罪恶及可能带来的灾难也有着同样的焦虑,他害怕与侍萍的任何瓜葛令他失去现有的一切:财富与名誉……对于命运的极端恐惧折磨着每一个强烈欲望中的灵魂,他们焦灼的心情恰似雷雨前沉闷压抑的天空。然而被残酷命运所驱使的人们并不是宿命地等待最终的审判,顽强的生存意志与求生本能促使他们不断挣扎。因此在困境中的垂死抗争形成另一种“神秘的诱惑”——对于生命力的张扬、礼赞与崇拜;具有“魔鬼”般性格的繁漪两次人生选择最充分地燃烧着这种生命力的激情火焰;柔弱的周萍也在极力摆脱继母的纠缠;善良的四凤冲决一

收稿日期:2007-08-31

作者简介:李旭(1971-),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切障碍紧抱自己的幸福;不幸的侍萍以极大的隐忍承载命运的苦难……这“神秘诱惑”是摆脱沉重的轻松。正如朱光潜所说:“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12]206}然而,命运毕竟是命运,它的残酷性就在于:侍萍想躲避的躲避不了;周朴园想维持的维持不了;繁漪想挽留的挽留不了;拆散周萍与四凤的,也是不可知的命运。“芸芸众生在欲望和命运的苦难中,徒劳地挣扎搏斗,最终还是在劫难逃。”^{[13]145}《雷雨》揭示了非人的异化力量无所不在,命运具有令人恐惧的巨大统摄力。

二、爱情悲剧

《雷雨》现实冲突的直接原因,是周公馆的大少爷周萍同继母繁漪、女佣四凤非分的三角恋爱。无爱的婚姻,给繁漪造成了极大的心灵损伤:人格屈辱,性压抑、性饥渴,逆反心理。在她沉静的外表下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狂热和仇恨。五四精神重新燃起了繁漪作为女人的内心情欲,她决心像沉睡的火山一样,“热热地冒一次”、“烧一次”。她内心燃烧着对周萍不可克制的爱火,那是她的最后的希望,但又怀着被周萍遗弃的恐惧。作为一个30多岁的女人,心如死灰时突然得到了一个爱情,她要死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为此连毁灭这个世界都在所不惜。她最后连自己作为母亲的脸色、太太的脸色都不要,对周萍说:“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你不离开我。”为了挽回已经失败的爱情,她把自己降格到这么一个卑贱的地步,惟一的目标就是希望自己的恋人不要走。可是最后不仅挽回不了,而且导致的悲剧是整个家庭的崩溃,三条人命的消失。这是人性与个性复苏以后得不到合理的表现形式,应该发生而又不应该如此这般的畸形爱恋。壮烈的要求与狭隘的选择,勇敢无畏的行动与“乱伦”的形式之间难以克服的悖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支爱情梦幻曲的悲剧性质。繁漪的悲剧,是在一个无爱的婚姻之外,又爱上了一个不应该她爱,而又不得不爱的人的悲剧。

再看周萍与四凤的爱情,他们的爱情是纯洁真诚的。周萍因为对四凤的爱,宁愿忍受大海的一记耳光,并结束和忏悔了与繁漪的关系。他爱得那样深,以至爱得很苦,苦闷和渴望都是为了四凤,甚至

去矿上工作也是为了早日把四凤带出去。他不仅一往情深,而且爱得相当认真。四凤,也是全身心地爱着周萍,母亲的嘱咐无济于事,还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周冲的“求婚”。总之,周萍与四凤的爱情,可以说是朴园和侍萍的爱情的重现。然而,也如同父母的爱情一样,他们的爱情最终成为悲剧。他们最终难逃命运的摆布,陷入血缘乱伦的泥沼。

最难解读的是《雷雨》现实冲突的深层原因——周朴园与当年梅侍萍(现在的鲁妈)的爱情。因多种原因,历来读者和批评家大都从阶级立场出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代表周朴园对无产阶级弱女梅侍萍的始乱终弃。如果细读曹禺的《雷雨·序》和文本,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简单的认同。曹禺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又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作为年仅23岁又一直生活在封建大家庭里的曹禺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他要写的只是一种“诱惑”,一种“憧憬”。这种“诱惑”和“憧憬”就是爱情,也包括周朴园与当年梅侍萍的爱情。细读文本,可以看出周朴园与当年梅侍萍是真心相爱的,而且爱得刻骨铭心。梅侍萍是周朴园第一个所爱的人,被赶走是在27年以前,那么,一个少爷和一个老妈子的女儿的恋爱的时间最起码是3年。两个人同居了3年,生了两个孩子。她不是偷偷摸摸地躲在自己家里给他生孩子,而是在周家生的孩子;而且他们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的环境布置。梅侍萍被赶走以后,周朴园保持了当年的所有家俱和所有摆设。他到东到西总都带着,而且陈设布置仍按照30年前侍萍动用时的样子。每年4月18日,都不忘记为她做生日,一切都照着她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待。甚至因为侍萍在生周萍时受了病,总要关窗户,他到现在,即使在夏天,这个房间的窗户还是不许人打开。当初把侍萍赶出家门,以及要他娶名门闺秀,都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周朴园别无它法。为此,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和深深的歉意。这种痛苦和歉意害了他后来的两任妻子。周朴园因为对侍萍之后名门闺秀的婚姻不满意,才出国留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里仍然想着侍萍。繁漪再嫁给周朴园,当时也是17岁,深受西方新女性影响,热烈而任性,但每当繁漪闹得他心烦的时候,他又想到了梅侍萍,又想看看梅侍萍的遗物,穿衣服,不管是雨衣还是衬衫,都爱穿旧的而不爱穿新的。可想而知,周朴

园真的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他巨大的心灵创伤是不能磨灭的。因为这样也导致了后面两任妻子的悲剧。可以说,梅侍萍不仅是周朴园第一个所爱的人;而且也是他惟一真爱的人。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封建强权与道德造成的。

三、性格悲剧

所有的悲剧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悲剧,而人的悲剧根本还是性格的悲剧。丹麦悲剧理论家索伦·克尔凯郭尔说:“悲剧性格是一种性格内部充满矛盾的性格,在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意识与潜意识,‘自我’与‘他我’,善与恶,美与丑等对立因素的激烈厮杀,加上外在世界的洪波巨浪的冲击,每每使得他性格中的正面因素遭到否定,从而导致他的毁灭,并使他带上悲剧的审美意义。”^[43]在《雷雨》众多的悲剧性格中,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在年轻时受新思想影响,也曾有过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但他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残酷的生存环境,使他既有资产阶级的铁的手腕,果断而残酷地镇压矿工罢工,不择手段地收买、瓦解工会;又有封建家长的专制,要求繁漪恪守封建妇道,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意志和情感要求。他甚至连吃药和看病这样的琐事,都要她言听计从,不得违逆。他不但是经济、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且也是家庭伦理关系和道德精神上的君主。这一切使他和周围的人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而他也终于在这重重矛盾中,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境地。专横、自是和倔强,是周朴园性格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而这也是他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事业成功的性格要素。但他的内心世界也不乏痛苦和软弱。自己无爱的婚姻不得不保留,对侍萍怀着无尽的歉疚与怀恋,“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最终崩溃。他一手造成了周围人的痛苦,也给自己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苦痛。尾声中修女在读《圣经》暗示着周朴园的忏悔:这是他的最后归宿。周朴园的悲剧是封建伦理道德侵蚀资本主义精神后导致的性格悲剧。

与周朴园一样,繁漪也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她既同年青人一样渴望自由纯真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名义上的妻子,实际上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但她生活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新思想的吹拂,一颗冻僵了的心苏醒了,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在无人可爱中寻找自己唯一的爱。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她的性格已经被扭曲,《雷雨·序》中说:“她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为争取个人幸福,她不惜做困兽之斗,哪怕和整个世界厮杀。她预料到酝酿中的暴风雨也许会无情地击碎她托付生命的船,但她意志坚定,毫不畏缩,宁愿在荒漠一样凄苍的晚景中放射出夕阳的全部余辉,然后沉沦。那段著名的独白,正是这种九死而未悔的悲剧精神的真实写照:“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当时我就再掉进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候你们。”这种彻底的反叛精神,明确的自我意识,只有郭沫若的《女神》才能与之相媲美。不过,繁漪实际上也确实是一个有点疯的女人。她在周公馆中已经煎熬了18年,18年无爱的婚姻和丈夫的威压已使她的性格被整个扭曲,最后总的爆发出来。也正是因为她这种歇斯底里、偏执半疯狂、厉鬼似的变态性格使周萍受不了,寻求彻底摆脱。繁漪最大的问题是,她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和选择,她是极端的自我中心,唯我主义。如果说爱本身就包涵着某些自我牺牲和承受,及对自己的约束,繁漪是丝毫也没有这些品质的。因此,繁漪的悲剧,她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侍萍和四风也具有典型的悲剧性格,她们是旧中国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但是性格上有很强的局限性,以至于很多时候是她们的软弱造成了自己悲惨的命运。这也是一个时代赋予妇女的不幸,世界没有告诉她们:她们是可以反抗的。侍萍忍辱负重,遭遇那么多不幸,却只认为那是自己造的孽,甘心在心里承受所有痛苦。如果她们也学会反抗,也具有一点“雷雨”的性格,那么也就不会承受那么大大心

理负担,或许还会获得个人的幸福。

四、道德悲剧

“悲剧性是一种道德现象”。^[178]《雷雨》的戏剧冲突,虽然有阶级斗争的成分掺杂其间,但主要还是人情、人性与非人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冲突,曲折地反映了五四时期新兴的市民价值观念——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同沉淀在传统的宗法制大家庭中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殊死矛盾。封建伦理道德原则,只能给他们提供悲剧的结局,这是生活的逻辑。所以周萍最终也向现实伦理关系和正统道德观念回归了。但“任何具体的道德判断或行为至多也只能是或然和偶然的”,^[179]所以繁漪根本就不承认这种不合人性的伦理关系。周朴园视繁漪的个性为精神病,并强迫其就医、服药,集中反映出封建宗法制不但剥夺了妇女的社会权利,也剥夺了人的精神自由。繁漪与周氏父子激烈、紧张、不可调和的悲剧性冲突,肯定了繁漪的情致和行动的合理性,揭示周氏父子所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假恶丑的实质,造成《雷雨》戏剧情调庄严崇高的一面。在一个女人受到一家两代人的欺侮层面里,《雷雨》暴露了封建道德的邪恶本质,批判了根深蒂固地遗留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家庭里的杀人的封建伦理道德。

《雷雨》所涉及到的问题是人类普遍的道德悲剧——乱伦。作品中写了三种乱伦:一是主仆乱伦。周朴园年轻时和老妈子的女儿梅侍萍相爱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刚刚生下鲁大海的时候,周家就逼走了梅侍萍。主仆之间不正常的恋情,结果始乱终弃,女方被遗弃,导致不可收拾的悲剧。这很像托尔斯泰的《复活》,但周朴园远没有聂赫留朵夫虔诚的忏悔和赎罪。很多年后,故事中的人物在命运的

安排下重新碰面,30年前的故事再次发生:周家大少爷又在不自觉中爱上侍萍的女儿婢女四凤。二是周萍和繁漪的乱伦。年轻的妻子繁漪生活在封闭的大家庭中非常苦闷,于是爱上了从乡下回来的丈夫前妻的儿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人性罪恶。古希腊悲剧里所谓恋母情结,指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情感,一种命运,而繁漪明目张胆爱丈夫之子,触犯人类的“禁忌”。三是兄妹乱伦。周萍乱伦的恐惧逐渐膨胀,同时,也受不了繁漪疯狂的爱,他想摆脱她的控制,摆脱罪恶的感觉,于是爱上了一个18岁的小丫头,单纯、朴素的四凤。但是,四凤和周萍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两人不仅相爱,而且四凤已经怀孕,单纯的主仆乱伦变成了兄妹乱伦,这比前两种犯罪更严重。主仆相爱,只要不是始乱终弃,就不是犯罪,人们完全能够接受。与继母相爱的家庭乱伦,这种家庭关系还是可以解体的。而兄妹乱伦是血缘犯罪,是无法解体的。最后四凤电死,其实是自杀,她只能是这样,她有着不得不死的理由。周萍也只能自杀,他也别无选择。这就是悲剧的力量,悲剧中毁灭的结果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 [1]朱栋霖.论曹禺的戏剧创作[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张隆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3]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 [4](丹麦)索伦·克尔凯郭尔.古老的悲剧主题在现代的反映[C]//索伦·克尔凯郭尔,等.悲剧:秋天的神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 [5](丹麦)西德尼·胡克.实用主义与人生悲剧感[C]//索伦·克尔凯郭尔,等.悲剧:秋天的神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曲晓红

On Formation of Tragedy in Caoyu's Thunderstorm

Li X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230039, China)

Abstract: Thunderstorm is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ramas. We can interpret it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with different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tragedy, it is absolutely a tragedy, not only a destiny tragedy, but also a love tragedy. It contains not only the elements of the character tragedy, but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al tragedy.

Key words: Thunderstorm; tragedy; destiny; affection(love); character; morality